

第一章 乘势而起，独揽山西 军政大权

“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。”这句话对一般人来说并不适用，但若用在阎锡山的身上则颇有几分道理。阎父曾是一个非常精于算计的商人，不幸因意外而致家道中落。正在走投无路之际，他们偶然发现了军校招考这根“救命稻草”。阎氏父子密谋策划请人代考，顺利过关，从此开始步步高升。辛亥革命风云突变，阎锡山以标统之职被推为山西都督；出身行伍的他却深谙官场之道，大耍手腕，很快就轻而易举地独揽了山西军政大权。

一 “骑墙”加“投机”：阎锡山发家的两大秘笈

我祖上世居定襄县，与阎锡山家有远亲关系，辈份上称他为表叔。在他父亲开钱庄时，我曾在他店里当过小伙计，与阎锡山幼年就混得很熟。阎从日本留学回来，当了标统，又经他介绍，我到军队里当哨书。后来又跟他当差遣，左右不离达三四年。至1913年正月，因我通知续桐溪逃避他设计陷害事，被他查出。我为了躲避他的重办，星夜逃出，再未回山西给阎做事。所以对

阎早年的历史，我是知道的。

(一)

阎锡山，字百川，乳名万喜，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人。生于1883年（清光绪九年）。其父阎书堂，字子明，乳名长春，由其上辈继承了一份田产，经其积年的刻薄经营，家业渐渐发达起来。但阎子明仍然心不满、意不足，认为仅靠收租放债，没有多大出息，总想找机会投资商业，以便获大利，广事剥削积累。恰巧这年（光绪八年），定襄县有个邢姓大户，原开的一月钱庄，因本钱短少，营业上不甚发达，屡想增资，好角逐商场。定襄县与五台县毗邻，地主豪绅们大多素有往来，邢、阎两家经人介绍撮合，就把这月钱庄合伙经营，因阎子明所投的资金较邢姓原有资金为大，所以他就成了钱庄的大老板，总揽了业务的大权。后因嫌定襄县地面狭小，商贾不如五台县殷实发达，营业资金出路上受到局限，于是把钱庄迁到五台县经营。自此阎子明就在商业上积极活动，加以他略通文墨，洞悉五台各界情况，大施其投机取巧、买空卖空的手腕，在金融头寸中兴风作浪，只有三年，就把这小钱庄经营得十分兴旺，阎子明也就在这小县城崭露头角，俨然自认为绅士了。

1888年（光绪十四年），阎子明的老婆曲氏在生下阎万喜五年后，忽得重病，医药无效，不久即死去。次年正月间，经人做媒，又娶陈氏做继室。这时，阎万喜已经6岁，逐渐顽皮起来，对于后娘的管教不服，因此家庭中不免发生些意见。阎父为了免得家中不和，就把万喜寄养到老丈人曲氏家中。曲家对这个外孙特别疼爱，照顾得非常周到。阎万喜本是独生子，在家玩的伴侣是很少的，到了外祖父家有一些表兄弟一起玩耍，也觉得比在家里好得多，所以后来有时偶然接他回家一趟，他都不大愿意。

样阎万喜一直到了 8 岁，经阎父与其岳父说妥，把阎万喜连同其表兄弟一并送入私塾读书。开始他还用功，老师对他还很喜爱，后来一年一年的大了，也就淘气起来，时常惹是生非和别人打架，给外祖父家添了不少麻烦。到阎万喜 15 岁那年，四书也读完了，曲家才叫阎父把他领回去。阎万喜回到家后，阎父便把他领到店里当小伙计，叫他好好学习生意。阎万喜名义上虽然是小伙计，可实际上是少东家，当然无人敢惹，先生伙计个个逢迎。说起来他学生意倒还用心，算盘打得精熟，也很会应付人，颇得一般人的好评。阎万喜 16 岁时，经阎父之命，凭媒妁之言，娶了一个徐姓的女子为妻，小两口甚为和美。

1900 年（光绪二十六年），因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关系，各地的商业直接间接都受了不少的损失。阎子明这 升小钱庄虽在偏僻的五台县，也受了很大的影响，加以京庄兑来款项被阻，出的钱帖子太多等关系，就发生了挤兑。最初阎子明为了维持信用，还拆东补西，设法维持，后来银根越来越紧，山西整个金融界都发生了危机，弄得都没法调度。阎子明卖了一些田地也无济于事，便上起门板，东家伙计一起走掉，这 升小钱庄就无言地宣告破产了。

阎父带着阎万喜背井离乡，到定襄县、崞县躲了些日子，经阳曲县辗转到了太原，因在太原没有什么关系较深的故旧至交，父子俩就住在柴家巷小店之中。本想用带出来的一点钱做个小本营生，先维持眼前生活，再图发展，无奈这时太原也是一片萧条景象，毫无办法，终日愁眉苦脸，唉声叹气。

有一天父子俩正在街上闲逛，看有好多围拢着看告示，挤

《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》说：阎的钱庄是 1900 年由于“打虎”生意失败而破产的。（见该书第二页）

进前去一看，原来是巡抚衙门创设武备学堂招生的广告。阎父看完就拉着阎万喜急急回了小店，父子俩商议起来。阎父鼓励阎万喜去投考这个武备学堂，阎万喜也很愿意；但自思百分之八十考不取，因为洋学堂的课程自己根本没学过，有的连听都没听人说过。父子俩说了半宿，议定只有找人当“枪手”的办法。阎父就想起了当时在山西大学堂读书的赵廉佑。赵是代县人，在阎父做生意时曾与赵家有过往来，也和赵廉佑见过两次面，这次在落难中想起了他，为了儿子的前途，只好硬着头皮去求他。于是第二天买了些点心，父子俩就到山西大学堂拜会赵廉佑。赵廉佑因情面难却，就答应了替万喜当“枪手”，到时顶名下场。阎父子二人千恩万谢辞了出来，痛快心情，自不必表。晚上阎父心想，儿子要考武备学堂，将来是个带兵的官，怎么还能叫万喜呢，况且这又是个乳名，应当起个响亮的大号，想了半天，因胸墨太浅，想不出什么名堂来。阎父这人非常迷信，于是就想到给儿子算算卦，看看能否考上，或叫什么名字好。第二天就跑到一家粗通周易会批八字的算命馆。据说这位算命先生是久考不中的老童生，书读得不错，且能书善画。经这位先生推算了一番万喜的生辰八字，说是五行缺金，并断定这次应考一定得中。阎父就请这位先生结合万喜的命相，斟酌赐一响亮的官名。经再三推敲商酌，就决定了“锡山”二字，从此这个阎万喜，就叫阎锡山了。

到了武备学堂报名的那天，阎锡山办了一切应办的手续，领了入场证，多日来不安的心情，安定了一半，然后又把入场证，送到山西大学堂，交给了赵廉佑，并又重新拜托了一番。

当武备学堂初办之时，各省都是一样，并没有什么严格的规章制度，根本没有交验相片的规矩，况且赵廉佑的年龄只比阎锡山大两岁。到了考试那天，赵廉佑“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”，一早就进场应考。赵廉佑在山西大学堂，原也算是一个好学生，功

课不错，把考试题目一看，觉得很平常，就满意地完成了考卷。等到发榜那天，阎父子俩前去看榜，阎锡山三字竟名列前茅，被录取了。父子俩当时的喜悦心情，自不必说。所以后来赵廉佑在阎锡山统治山西时期，总有个官做，也捞到了一些油水。阎父在阎锡山进入武备学堂以后不久，五台钱庄的债主逼债挤兑情况也冷了下去，便对儿子叮嘱了一番，就回五台收拾那份破家业去了。

阎锡山进入武备学堂以后，确也努力用功，对一些出操、训练等军事科目，很是用心。对于教官、督练官总是毕恭毕敬，表现得非常驯顺，日子久了，渐渐博得老师们的欢心。在同学中也拉拢了一些学科、术科好的同学作为知己，后来竟当了一名学生班长，很得学堂和老师们信任。

1904年，清廷遴派各省武备学堂优秀学生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，阎锡山因得到学堂老师们的信任，也被选中；同时入选的还有马开崧、温寿泉、王宝善、黄国梁、张维清等。

这年7月，北方各省奉清廷之命，入选学生先到北京集中，会齐同赴日本。到北京住了不到一月，听了兵部侍郎姚锡光的讲话后，又玩了几天就乘船到日本去了。

阎锡山到了日本，先入振武学校，以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。他学习兢兢业业，努力用功，除了对日本的教官极尽恭维之能事外，就是对日本的学生也是卑词谄谀。

当时（即1905年）正是爱国人士对清朝腐朽无能深恶痛绝的时候，孙中山、黄兴（克强）先生所组织的同盟会在日本非常活跃。阎锡山看到这种潮流情势，也活跃起来，在进步人士面前尽量表示对清朝不满，不久他参加了同盟会。此后，他更加表现出“革命”干劲，经常奔走围绕于同盟会人士之间。不久又进入了黄兴、陈之骥、李书城等组织的“丈夫团”。

当时山西留日学生中尚有学习其他科目的赵戴文、南佩兰（杜馨）等数人。赵戴文文学基础较好，亦系五台县人，原与阎家有世交关系，阎锡山为了拉拢一些功课较优的学生，对自己有帮助，就与赵戴文、黄国梁拜了把兄弟。并对活跃的日本学生广事结交，如土肥原贤二、樱井隆治、坂垣征四郎等都与他时有往来。1913年（民国二年）正月，樱井曾秘密到太原访过阎。

1909年（宣统元年），留日士官生第六期结业，阎锡山等学成归国，由横滨经上海回到北京，在陆军部报到后，经过考试传见后，在北京玩了足有两个月，直到中秋节才回到太原。这时山西巡抚是丁宝铨，新建军的督练总办兼协统是姚鸿法（姚鸿法是北京陆军侍郎姚锡光的儿子）。当时清政府规定留学生回国后，一般都先当教练，看看成绩如何，再行补充当队官等职。因阎锡山善于钻营拍马，嘴甜如蜜，把姚鸿法哄得晕头转向，阎虽名为教练，但不常到队里去，总是呆在督练公所围着姚鸿法转，替姚出谋划策如同参军一样。姚鸿法当然也乐得有个帮助他办理琐事的，日子一久，阎锡山在督练公所里就与其他留日归国的学生不同了。

（二）

山西混成协中有一标统齐允（旗人），素来吸食鸦片，为人懦弱无能，与姚鸿法处得不协调，姚总想换掉他，因见黄国梁年轻能干，就免了齐允，将黄升了标统，温寿泉、马开崧也都陆续当了管带。阎锡山为了广事拉拢培植私人势力，经过姚鸿法的允许，还兼了陆军小学的日文教官。后来为他奔走效命的张培梅、周玘、朱蒙滋等当时都是学生，他们与阎的关系，就是在这时建立起来的。阎锡山凭着两面手法，百事百通，颇为得意，但有时想：仅联络了一些军官，总不能算掌握了军队。这时山西新军混

成协内只有两标，一标已被黄国梁掌握，另一标标统是夏学津，夏既有靠山人也干练，很难下手取代，可是要想抢夺新军的领导权，还必须把夏学津挤走，取而代之不可。

事有凑巧，1909年（宣统元年），清廷下了全国禁绝鸦片烟的命令，要在六年内各省完全禁绝。次年（宣统二年），山西巡抚丁宝铨为了邀功，竟蒙奏清廷说：“山西全省已完全禁种，吸食者不久也可绝迹。”事实上山西文水、交城一带，不但没有禁绝，反而较原种面积更为扩大，烟苗也特别茂盛。清廷收到丁宝铨的奏折后，就在4月间派钦差前来查勘，这一下可急坏了丁宝铨，如被查出，岂不要负欺君大罪。于是派夏学津带兵星夜去文水、交城一带，勒令县知事立即将所种烟苗铲除。种烟农民向以此为生，他们为了生活，怎肯奉命？于是男女老幼成群结队地哀求收回成命，县长和夏学津不敢应允，而农民因老幼生活所关，势非达到保护已种烟苗不可。这时夏学津为了完成任务，就令兵士亲自动手拔除烟苗，弄得遍地男哭女嚎，拉着士兵不让动手。夏学津一看怒了，就命令兵士开枪恐吓。这一开枪，就激起了众愤，有的人就喊叫宁可被打死也不能饿死。人越聚越多，越说越僵，结果烟农死伤数十人，烟苗被铲除得干干净净。丁宝铨为了掩蔽这一场屠杀农民的滔天罪行，竟诬烟农为匪，上奏清廷。山西各界见此情形，纷纷联名要求清政府惩办凶手，赔偿损失，抚恤死者。

阎锡山睹此情形，认为这是一箭获双雕的好机会，于是就大肆活动。他一方面利用民愤，对巡抚丁宝铨表示反对；一方面派张树帜、李嵩山等到处煽风点火，并秘密派人到出事地点进行调查，把当时情况绘声绘影地写成稿件，交由《晋阳公报》发表，并写些黑名帖到处张贴，弄得太原满城风雨。这一折腾，北京的《国风报》、上海的《申报》也转载了这一消息，可以说是全国上

下，舆论哗然。阎锡山、赵丕廉等又鼓动素有“猛张飞”之称的张树帜到北京告了一状，事情就越发热闹了。经过御史胡思敬奏参，清廷把丁宝铨撤职留任，标统夏学津则撤职查办。于是这个标统头衔就稳稳地落在阎锡山头上。

这时正闹预备立宪问题，各省都成立了咨议局，山西省咨议局长是梁善济。阎锡山既已抓到一部分军权，就又在政治上打了主意。他为了接近这个所谓代表民意的咨议局长，费了不少精神和钱财：始与梁的秘书邢善长拉上关系，继而结为金兰之交，得邢的誉扬，逐步得到梁善济的青睐，取得立宪派的信任；同时他利用同学、同乡、拜盟兄弟等手法，居然把自己变为混成协内同盟会的秘密领导核心了。但是有两个管带对阎的为人素来鄙视，绝对不买他的账，曾使他伤了不少脑筋。这两个人一个是姚以价，一个是熊国斌；后来熊因刺阎未成，反而被阎杀死，而姚以价则坎坷终身，并曾几度被阎赶出山西。

（三）

1911年（宣统三年），各地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风起云涌，清廷轴心已烂，已呈土崩瓦解之势。虽然立宪派在各省吹吹打打，想用民族调和的办法暂维清朝的统治大局，但也未能邀准爱新觉罗们的应允。10月10日同盟会革命党人首先在武昌举起了义旗。东南各地纷纷响应。消息传到这素称黄土高原的西北，有志之士也都跃跃欲试，至10月22日，陕西张凤翔等宣布了起义。山、陕地势相连，这一消息在山西更为振人心弦。革命党人景定成、李鸣凤、续桐溪等都在计划相互策应。当时清廷在山西的军队，只有姚鸿法这一协装备较好，其余如巡防营、警察队等，都是吃局弄赌专门吓唬老百姓的“瘪货”，没有多少战斗力。

这时山西巡抚已由原任江苏布政使的陆钟琦接替，他听到陕

西革命的消息后，即与三司和姚鸿法等相计议，并由平阳总兵调马步兵集中待命。他们认为黄国梁所带的一标靠不住，便决定以防止陕西革命军东渡为名，调黄部离省城以防意外。这时阎锡山的一标则被认为是可靠的，因此对他疏于防范。由此也可看出，阎对清廷派在山西的上层统治人物，是如何工于心计了。

黄国梁接到开拔调防的命令后，本想就地举事，马上在太原动手，但无奈军队只有枪没有子弹（这是清廷防止新军叛乱的一种办法，各新军平时只有枪支不发子弹）。黄、阎和温寿泉、乔煦等商量的结果，认为只有遵照命令答应出发才能领到子弹，等领到子弹后再返回头来攻打太原城。商议既定，次日黄国梁即带着部分部队先行出发，把领械弹给养的部队则派为后续部队。当后续部队把应领的给养械弹领到手后，运到太原城南没有几里地就放下了，并派人骑马追赶通知黄国梁迅速回马攻打太原。这一行动本来是事先商议好的，队官们也早就心中有数了。各管带队官见黄国梁尚未赶到，又想事不宜迟，就公推张树帜为指挥官。很快黄国梁的后续部队就回马攻城，打响了山西起义的第一枪。这天是 10 月 29 日，新南门很顺利地被攻开了。接着分兵两路，一路打新满城，一路攻向巡抚衙门。守城的统领谭振德等闻知兵变，尚拟镇压，但刚一出门即死于乱枪之下。巡抚陆钟琦和他的儿子陆光熙亦被起义军枪杀。说起来，陆光熙倒是有些冤枉，他是留日的士官学生，与同盟会革命党人有一定的联系，也是同情革命的，据说此次到山西是为了劝他父亲反清复汉，不料事起突然，也遭杀身之祸。

阎锡山听到黄国梁的队伍已围攻巡抚衙门，才下令他所带的

以后在姚以价表示赞成起义后，张树帜以姚为二营管带，地位较高，和苗文华、应芝等商议，公推姚为司令官。（参见《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》第十八页）

八十六标队官张培梅进攻防守太原的巡防营马队，他自己则带领几名亲信藏在树林子内观战。他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起义成功，则是大功一件，倘若失败就可把造反的责任推到黄国梁、张树帜、张培梅的身上去。

在起义军初攻巡抚衙门之时，守护太原城的清军还想拼命抵抗，后见统领巡抚相继被杀，也就各自四散逃命去了。等到重要地点白旗高挂，起义肯定是胜利了，阎锡山才带着人马煞有介事地杀奔巡抚衙门而来。阎锡山到了巡抚衙门，虽然军事行动已经结束，但一切还很纷乱，他无心顾及他，主要考虑是如何拉着盟兄弟们，抓取胜利果实。经过大家计议，一致认为应该推举一个素有威望的人来撑持这个局面，以安人心。你一言我一语地议来议去，都想推姚鸿法为都督，因为姚是汉人，又是新军的协统，一些军官们对他尚有好感。阎锡山见此情形，也只有附和众议。但把姚找出来后，姚因顾虑他父亲仍在北京任职，如果自己出任了山西都督，岂不把父母送到菜市口刑场去！就婉言谢绝了大家的要求，并建议另选贤能。这时有人嚷道，我们起义刚刚告成，一切善后待理，我看还是大家都集中到咨议局去商量商量，再作选都督的决定为好。大家一听，言之有理，就都说对对、好好，我们都到咨议局去。惟有阎锡山这时沉着个脸，表现得心事重重的样子。

起义军官兵们一窝蜂地跑到咨议局，会议室里黑压压地坐满了人。梁善济就对咨议局庶务常樾说，叫大家坐好静一下，开会罢。但开会之前没有人宣布开会宗旨，不知道是谁在墙角喊了声，请率领起义的统领管带大人们先讲响应武昌革命的经过，接着就都说“好好！对对！”于是坐在前边的温寿泉、姚以价、乔煦、赵戴文等就相继把起义成功的经过吹嘘了一番。接着请梁善济讲话。因为梁讲话文当绉的，除了光复祖宗基业、大夏神州

宾服四海之外，一些话都让人听不大懂。梁讲完话，阎锡山也东拉西扯讲了些反满复汉、庆祝成功的话。以后，大家对选都督的事嚷起来了。梁善济主张用票选，他拿着一叠红纸，拟作选票。正在梁善济讲解选举如何是大事，如何是民为邦本的时候，张树帜一个箭步跑到台前，把手枪往桌上一拍，并把梁善济挤到一旁，大声地叫嚷说：“选都督做么子要票选，我们军人不干这一套，要选就举手好了。他也不等众人表示意见，接着就大声地喊叫：“选阎标统做大都督，赞成的举手！”这时张培梅等就丁零当啷地把会议室大门一关，随即亮出了手枪，并大喊着说：“选阎锡山做大都督，请大家一齐举手！”这时阎锡山的盟兄弟们也一齐喊叫起来：“选阎锡山，选阎锡山做都督！”一些军官当然纷纷举手。至于那些议员绅士老爷们，除了吓得哆嗦打牙说不出话来以外，也只好举起手来说：“选阎标统好，选阎标统好了。”

正在为选举乱嚷怪叫的时候，梁善济就从后门溜走了。

在手枪威逼之下，张树帜连喊两声全体赞成，张培梅也接着喊了几声，阎锡山当选大都督就算全体通过了。阎锡山这时又站起来，假装客气了一番。随后又选出起义作战最力的温寿泉为副都督。这一场真武装假民意戏剧式的选举才算告成。

（四）

都督当上了，善后怎么办，人事如何安排，军政饷精处处需款，阎锡山在赵戴文的启示下，决定成立“大汉银行”，印发山西通用票；但对这银行总理人选，大费踌躇，想来想去是非用自己人不可，于是阎的老丈人徐一敬就当上了“大汉银行”的总理。至于军队方面人事安插，倒不成什么大问题，只是他顾及姚以价这人不好办，非给个大大的名义不能羁縻他、使用他。但又怕姚在太原捣乱，于是他决定给姚一个东路军司令，并把赵戴文任为

都督府参谋长，让他随姚东征，率军进驻娘子关。与其说是叫姚东征，不如说是叫姚给他看门；但他又怕姚不可靠，变成吴三桂，所以特叫赵戴文监视他。赵本不是军人，但当时在一般人眼中，他是有才善说而又计谋多端的有为青年，而阎要重用他，主要是因为他对阎臣服不二、忠心耿耿。

姚以价和赵戴文走后，阎紧接着又发表刘汉卿为南路司令，张瑜为北路司令，并令张配合地方武装取道雁门向北进军，光复大同。同时把原有的军队改编为四个标（相当于团），以张煌为第一标标统，苗文华为第二标标统，第三标标统由刘汉卿兼任，第四标标统由张瑜兼任。经过几天的紧急筹划，在太原的军队整编大致初步完成。阎对驻在山西各地的清室官吏和防营，采取了劝降的办法。这些事情都进行得很顺利。

一天，吃晚饭后，外边通报说原八十五标三营管带熊国斌求见，阎锡山一愣之后说：“他们又出了什么事？请他进来吧。”熊国斌进来后，一言未发，掏出手枪就向阎锡山射击，阎一惊就溜到椅子下去了。也正因为溜到椅子下，子弹才由头上飞过未能击中。熊拟再开第二枪时，阎锡山已抄起铜痰盂打了过去，正在这时阎锡山的卫兵向熊连开了三枪，一枪打在熊的腰部，一枪打在熊的屁股上，另一枪则打在墙上挂的山水屏上。行刺未成，熊国斌当场被擒。原来熊是不赞成革命的，一向主张效忠清室，他见阎锡山当了都督，对他又不提拔，心中更加怀恨，所以想杀死这个起义都督，以建奇功。詎料反被阎锡山生擒，扔进石灰池里活活烧死了。这消息传出后，熊的士兵就在太原城里烧杀抢劫起来。阎锡山听了吓得不敢出屋。幸赖副都督温寿泉，亲自带着队伍将乱兵镇压下去。经过一天一夜之后，市面才安定下来。

(五)

山西响应革命起义，巡抚陆钟琦父子被杀，消息传到北京后，清廷旋即发表吴禄贞为山西巡抚，命其带兵入晋平乱。但吴禄贞也是革命分子，早就计划推倒清廷，只是尚无行动表露。他得此机会，就将队伍集中在石家庄一带，并派人与晋军东路司令姚以价联络，想配合行动，共图大举，率军进攻北京。姚以价事体重大，未便轻允吴请，就电告阎锡山请他到石家庄共同商议。阎锡山因被熊国斌的一枪吓破了胆，踌躇再三不敢前往，虽经温寿泉等相劝，总是犹疑不定。最后他听见说晋南民党的李鸣凤、景定成等都应吴禄贞之约，已进兵娘子关一带，觉得自己若再不出头，必然被晋军一些将领耻笑，他这才打电报给赵戴文，问赵他到石家庄来是否安全，在赵答复他“可以来，没问题”之后，他才安排东上，嘴里还不断地吩咐卫队们说：“挑好的家伙带着，多带上些子弹，这是冒险的事啊！处处要谨慎小心啊！”阎锡山既已决定东上晤吴，大家都很高兴，想不日将有惊人的奇迹出现。正在准备动身的时候，阎锡山忽然又变卦了，他说：“石家庄我不能去，那是吴禄贞的防地，万一有变，那可怎好。”经人又与赵戴文、姚以价联络了半天，才把吴、阎会晤的地点改为娘子关。后来听说在赵戴文与吴禄贞改订地点的时候，吴禄贞曾说：“昔日关云长敢单刀赴会，何以今天的阎百川不敢来见盟友，岂地灵人杰耶？时移势易耶？”说完哈哈大笑，并说我到娘子关去见他好了。11月某日，阎锡山带着黄国梁、马开崧、张树帜等，并由大批警卫人员护从到了娘子关车站；而吴禄贞则轻随简从，只带着参谋孔庚等三人。在会上吴禄贞滔滔不绝地述说他的革命计划，主张组织燕晋联军，进军北京，并肯定地说，现在清军大批南下，北京空虚，只要我们队伍一抵北京城下，革命大业

就算定了。阎锡山等认为吴的分析很有道理，意见趋于一致，公推吴禄贞为燕晋联军总司令，阎锡山为副司令，山西先拨两营兵给吴禄贞指挥，随后再出一旅为后继军。詎料因吴禄贞扣留南运械弹，惹怒了袁世凯，袁派人秘密刺杀了吴禄贞。吴禄贞被刺消息传出后，山西派出的队伍只好又由统领管带带着退回山西。而吴的部下孔庚等数人也随着退到山西，其他人大多四散了。这燕晋联军，只是昙花一现。

吴禄贞死后，清廷随即发表张锡奎为山西巡抚，接着命令曹锟的第三镇第五协由卢永祥指挥，经井陉乏驴岭向娘子关进攻。姚以价指挥晋军抵抗了三天，虽士兵奋战，终以众寡悬殊，后方援军不继，在雪花山受到清军正侧夹击以后，损失严重，败退下来。姚以价在撤退时，几乎被清军迂回前进的部队活捉，幸赖他地理熟悉，爬荒山，穿小径，才退向晋南，得以逃脱。赵戴文系文人出身，在开战时他总是在队伍的后面，所以在退却时他跑在前头，未遇什么惊险，后来他还收拢了一些败退下来的队伍。阎锡山说他临大事而不惧，给他记了一功。

（六）

东路不支，娘子关失守，清军人晋的消息传到太原，阎锡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在都督府里转来转去，接连开了两次会议，也没议出个万全之策来。这时阎锡山主张放弃太原，赵戴文、张树帜等也附和阎的意见；但副都督温寿泉不同意，他主张阎锡山坐镇太原，以免动摇军心，影响革命大业，温并主张，主动出击，阻击清军于太原外围。由于阎锡山坚决不肯留太原，怕当清军俘虏，结果，只好决定由温寿泉镇守太原，全权指挥前方抗清事宜。此后阎锡山与赵戴文等，就跑到包头避难去了。

在阎锡山等向包头方面逃跑的时候，正是北路军攻打雁门关不下，孔庚、张瑜等带队退到怀仁县整顿的时候。他们听到娘子关失守，阎锡山已出走包头，于是孔庚、张培梅等也就带着队伍向包头方向靠拢，希望与阎锡山会合。这时协统张瑜因雁门关作战不利，跟张培梅等又发生了一时不能调和的摩擦，加以他对于革命丧失了信心，就离开队伍走了。后来这个协的协统就由张培梅暂代，不久阎锡山便派他正式升任了协统。

一天阎锡山带着残兵败将行至保德，忽见孔庚、张培梅带着从雁门、怀仁退下来的军队来找他，心里特别高兴。但这时军队大多还没穿上棉衣，吃饭也成了问题。于是大家计议了一番，认为首先必须派人先筹划一些给养，河曲县素称富足，以先向河曲筹款为宜，便派张树帜带上一些军队即时前往。

张树帜到了河曲，见到该县知事，说明奉都督命为筹办军需，要借银二万两，诂料这位县太爷不买账，并与地方绅士大户串通一气用罢市来抗拒，惹得张树帜火了。一天张来到县衙，指挥士兵把县知事为首的绅士大打了一顿，市面就马上开了市，二万两银子马上也借到了手。

阎锡山带着人马刚到古城，忽报包头革命党人杨瑞鹏、王肯堂前来求见。原来杨瑞鹏等原拟在包头起义，响应革命，并已说服清军管带谢有梓参加起义。惟有五原同知樊恩庆表面上赞成起义，暗地里却另有打算，他在宴请革命人士的联欢会上，把所有出席的革命人士和同情革命的军官全都逮捕杀害了，杨瑞鹏、王肯堂因事外出，未遭此难。杨等听说阎锡山等到了古城，所以特地来投，并要求进攻包头，为死难同志报仇。第二天在大同方面起义失败的李德懋因在丰镇起义失败，也率领一部分骑兵来投。阎锡山一看人马步兵已有 3000 出头，胆子也就大了，于是和大家商议了一番，就分兵三路直扑包头。包头守军樊恩庆见起义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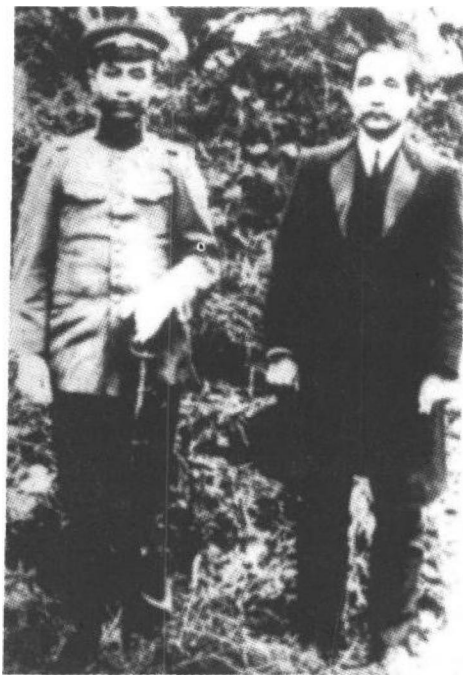
突然进攻，莫明军队从何而来，只好仓皇应战。因他的军队不足起义军的半数，只半天多的时间就被起义军打得落花流水，未死的少数官兵也就四散逃跑了。革命军随即冲进城内街市，阎锡山也随军进了包头。

（七）

袁世凯于 1911 年 11 月被清室起用，到了北京，他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，大耍其两面手法。次年 3 月南北和议之后，山西巡抚张锡銓也调往他处。清军卢永祥部为了追逐温寿泉、李鸣凤的革命队伍，由太原转向晋南，经平遥、介休、灵石而后进入赵城。因抢掠已足，不久转回了直隶。清廷大军既已离开太原，宵小甚为活跃，外县乱糟糟的情况不用说了，就是省城太原偷盗抢劫之事，也时有发生，闹得家家不安，鸡犬不宁。这时咨议局副议长杜上化派代表来到包头，要阎锡山还省主持大计。阎锡山认为虽然南北已在和议，但今后局势尚难预料，包头比较稳当，他不愿也不敢回省冒险。直到咨议局二次派人来催请，他才答应回省，但仍然是心悸不安地缓缓而行。2 月 19 日，行到忻州县境时，忽然接到袁世凯一封电报，内容词句记不清了，大意是不准他擅自行动。这一个意外，使阎锡山着了慌，他只好在忻州住下，但又不能把这一消息传出去。阎的盟兄弟虽然都用尽脑子想办法，但什么办法也想不出，弄得大家都懒吃懒睡，昼夜愁眉苦脸。幸赖黄国梁把军队安排得有条不紊，撑持着这个都督行署的门面。一天晚间，阎锡山忽然想起一个主意，请南桂馨到上海，见见中山先生，报告一番他在山西起义的功劳，请中山先生大力支持他们回太原。同时，阎派人发电报给他在南京、上海和武昌的同志，要求他们给以支持。阎锡山这样做过以后，还怕不牢靠，又想起了一个两三代以来都在北京皇宫包揽工程的定襄县人

董崇仁。董氏家大业大，在北京与一些太监头儿王爷长史多有深交，袁世凯做直隶总督的时候，与董也有拉拢，这是阎早就知道的。于是他卑词厚礼派我到定襄去请董崇仁到忻州会面。董崇仁到了忻州，阎锡山厚礼款待自不必说，两人越谈越近乎，在阎把请他代向袁世凯处疏通的话说出后，董慨然允诺，并答应马上去北京。董到了北京见到袁世凯，确实替阎锡山说了不少好话，对于让阎锡山仍然担任山西都督的事，起了转圜的作用。这时南桂馨也到了上海，把山西起义的事自然是大肆吹嘘了一番。旋经中山、克强两先生与袁世凯一再电报商榷争论，才把山西列为起义省份，正式委任阎锡山为山西都督。阎锡山在忻州接到任他为都

督的命令后，如获圣旨一样，多日悬在心里的石头，才算落了地。他高兴地说：“这也是我阎家祖上有德，山西百姓不该遭难；今后我一定把山西治理得好好的，让袁世凯他们看看我的本事。”于是派骑兵一排送命令给太原各机关，并传令第二天人马一齐向太原进发，沿途威武炫赫，在乡里面前很夸耀了一番。这与狼狈逃出太原的时候，悄声急走的情景大不相同了。



1912年9月，阎锡山同到太原视察的
孙中山合影